

东晋桓温幕府文士及文学活动考略

龚 斌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062)

摘要:东晋军事强人桓温任荆州刺史数十年,他不仅是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有着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喜招揽人才,四方文学才能之士云集,荆州遂成为当时主要的文学创作中心。钩沉桓温军府中的众多文士,描述他们的文学活动,评述其中的佳作,可以部分地显示东晋文学史上早已丢失的一段繁荣。考述桓温幕府的文士及文学活动,证明古代的文学创作往往与家族及地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说明幕府文学是文学史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桓温幕府;袁宏;顾恺之;战争;游宴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365(2019)01-0110-08

自东汉末年始,荆州就已成为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州治江陵扼守长江中游,西去巴陵,东至武昌、寻阳,南达岭南,北至南阳、关中,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东晋时,荆州的江陵和襄阳是西部的藩屏。军事上若失去荆州,则武昌、江州失去依托,必然危及京都建康。特殊的战略意义,促使荆州地区的经济文化相当发达。东晋中期,桓温长期任荆州刺史,他既具干练的政治军事才能,又有较高的文学天赋,加之喜招揽人才,文学才能之士四方云集,文学活动出现一时之盛。本文从史料和遗文入手,钩沉和梳理荆州文士集团的形成、创作活动以及相关的文学遗存。先述桓温幕府中的文士,次述他们的文学活动,最后评述他们的文学佳作。

一

东晋之初,王廙、陶侃先后为荆州刺史。王廙虽然“少能属文”,博通书画、音乐、博弈等技艺,但担任荆州刺史时间不长,而且大肆诛杀异己,结果“大失荆土之望,人情乖阻”(见《晋书》卷七五《王廙传》)。王敦之乱被平之后,陶侃为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此人勤于事功,珍惜寸阴,不喜《老》《庄》浮华。文学创作须冥思遐想,耗时费日,对于国计民生又不产生直接的效用,陶侃自然不屑此道。所以,侃镇守江陵时间虽长,却无闻吟咏。到桓温镇守江陵,才使荆州再次成为文化昌盛的地区。

以下先考述荆州桓温幕府文学集团中的成员:

1. 桓温(312—373)字元子,宣城太守桓彝之

子。选尚南康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后为琅琊太守,累迁徐州刺史。晋穆帝永和元年(345),桓温自徐州刺史迁荆州刺史。至晋哀帝兴宁三年(365)桓温以扬州牧移镇姑孰,而以弟桓豁为荆州刺史。此后的八九年,他一直居于建康附近的姑孰,原先荆州的一部分文士也随之东来。桓温整整二十年的苦心经营,使荆州成为桓氏家族的发祥地。

桓温著述颇丰。《隋书》卷三五《经籍志》载:“晋大司马《桓温集》十一卷。注:梁有四十三卷,又有《桓温要集》二十卷,录一卷,亡。”可见桓温当年著述的宏富。梁以后《桓温集》散佚严重,现仅存少数章表。桓温也能诗。钟嵘《诗品序》说:“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钟嵘所说的“桓”,即指桓温。孙绰、许询是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人物,而桓温也能玄谈,风气所染,故诗“平典似《道德论》”。

2. 郗超(336—377)字景兴,一字嘉宾。年轻时就已卓犖不群,交游士林,善谈论,义理精微,尤崇信佛教。先为征西大将军桓温掾属,晋哀帝兴宁元年(363),加征西大将军桓温侍中、大司马,郗超转为参军。郗超是桓温幕府中最主要的智囊,最受宠信。《隋书》卷三五《经籍志》载:“晋中书郎《郗超集》九卷。注:梁十卷,亡。”郗超诗文几乎全佚,仅存《奉法要》一篇佛学著作,以及《答傅郎诗》六章。

3. 王珣(349—400)字元琳,弱冠即为桓温主簿(当时桓温可能已由荆州移镇姑孰)。王珣与郗超

收稿日期:2018-11-05

作者简介:龚斌,男,上海崇明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陶渊明研究会名誉会长。

俱为桓温敬重。郗超长髯,王珣身短,府中语曰:“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晋书》卷六七《郗超传》)桓温经略中原,军中事务皆由王珣经办。王珣善写文章,《世说新语·文学》九五说:“王东亭到桓公吏,既伏阁下,桓令人窃取其白事。东亭即于阁下更作,无复向一字。”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说珣“学涉通敏,文高当世”。据王珣重作白事,居然与前作无一字相同来看,“文高当世”的评语,恐非虚誉。晋孝武太元中,“造晋江左宗庙歌十三篇,曹毗造十一首,王珣造二首”。(《宋书》卷二〇《乐志》)《隋书》卷三五《经籍志》载:“晋司徒《王珣集》十一卷。”注:“并目录。梁十卷,录一卷,亡。”另有《秋怀》诗残句(见逯钦立校辑《全晋诗》)。

4. 习凿齿(?—384)字彦威,襄阳人,为当地豪族。凿齿少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桓温辟为从事,甚得江夏相袁乔的器重,在桓温面前数称其才,转西曹主簿。《世说新语·文学》八六说:“凿齿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为荆州治中。”后因忤逆桓温,左迁户曹参军。生平见《晋书》卷八二《习凿齿传》。习凿齿著有《汉晋春秋》四十二卷,集五卷。又有《襄阳耆旧记》五卷(见《隋书·经籍志》),佚。今仅存《汉晋春秋》遗文及少数书札。

5. 伏滔(生卒年不详)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大司马桓温引为参军,深加礼遇,每宴席,必命滔同游。桓温死后,征西将军桓豁引为参军,领华容令。生平见《晋书》卷九二《伏滔传》。伏滔入桓温幕府的时间较早。《晋书》卷九二《袁宏传》说:“伏滔先在温府,与宏善。”袁宏早在永和年间就入温府,则伏滔为桓温参军必在袁宏之前。《晋阳秋》《中兴书》《晋书》等常以大司马称桓温,而温为大司马在兴宁三年(365),因此不能据伏滔为大司马桓温参军,就断定滔入温府必在兴宁三年之后。《隋书》卷三五《经籍志》著录有《晋伏滔集》十一卷。早佚。今存《正淮论》、《论青楚人物》、《望涛赋》(残)、《登故台诗序》(残)数篇。

6. 罗含(生卒年不详)字君章,桂阳耒阳人。太守谢尚与罗含为方外之好,称“罗君章可谓湘中之琳琅”。转州主簿。后桓温为荆州刺史,历官征西参军、州别驾、征西户曹参军、宜都太守。桓温封南郡公,引为郎中令。有人称罗含“可谓荆楚之材”,桓温说:“此自江左之秀,岂惟荆楚而已。”生平见《晋书》卷九二《罗含传》。《隋书》卷三五《经籍志》说:“晋中散大夫《罗含集》三卷。”今仅存谈理之文《更生论》

和《答孙安国书》二篇。

7. 罗友(生卒年不详),襄阳人,习凿齿之舅。《世说新语·任诞》四一说:“襄阳罗友有大韵,少时多谓之痴。”罗友任诞不拘,记忆力特强。据刘孝标注引《晋阳秋》说:罗友字宅仁,少好学,不持节检,性嗜酒,始仕荆州,后在桓温幕府。以家贫乞禄,温虽以才学遇之,但认为其作风诞肆,非治民之才,不用。后为襄阳太守,累迁广、益二州刺史。罗友文章全佚。

8. 孟嘉(生卒年不详)字万年,江夏鄢人。初得庾亮器重,辟为部庐陵从事,又为安西将军庾翼府功曹,再为江州别驾,巴丘令。后为征西大将军桓温参军。生平附《晋书》卷九八《桓温传》。陶渊明《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记叙较《晋书》详细。孟嘉擅长文学,陶潜《孟府君传》记述他被孙盛作文嘲谑,请笔作答,了不容思,文词超卓。惜作品无存。

9. 袁宏(328—376)字彦伯,有逸才,文章绝美。因夜咏《咏史诗》,得安西将军谢尚赏识,入其幕府。后为大司马桓温记室。据《晋书》卷七九《谢尚传》,建元二年(343),谢尚转西中郎将、督扬州之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桓温欲北伐中原,使谢尚率众向寿春,进号安西将军。袁宏文笔优美敏捷,专掌书记。桓温移镇姑孰,袁宏亦随至,一直到桓温去世。后任职东阳郡,卒于任所,时年四十九。生平见《晋书》卷九二《袁宏传》。袁宏著述颇丰。《隋书》卷三五《经籍志》载:“晋东阳太守《袁宏集》十五卷。注:梁二十卷,录一卷,亡。”又取材诸种《后汉书》,撰《后汉纪》三十卷,与范曄《后汉书》并传。并撰《竹林名士传》三卷及诗赋、诔、表等杂文凡三百余篇。

10. 袁乔(生卒年不详)字彦叔,先为桓温司马,后为江夏相。桓温谋伐蜀,众人都以为不可,而乔极力主战。因伐蜀功,进号龙骧将军,封湘西伯。按,桓温作荆州刺史第二年(即永和二年)伐蜀,则袁乔入桓温幕府的时间很早。乔博学有文才,注《论语》及《诗》,并诸文笔行于世。现留存《江赋》(残)、《与左军褚裒解交书》、《劝桓温伐蜀》等数篇。生平见《晋书》卷八三《袁乔传》。

11. 车胤(生卒年不详)字武子,家贫,好学不倦,博学,有夏夜聚萤照书苦读的佳话。桓温在荆州,辟为从事,甚受器重。引为主簿,迁别驾、征西长史。宁康初,车胤为中书侍郎、关内侯。生平见《晋书》卷八三《车胤传》。

12. 张望(生卒年不详)。他的生平事迹不见史

传。《隋书》卷三五《经籍志》载：“《晋征西将军张望集》十卷。注：梁十二卷，录一卷。”严可均辑《全晋文》据《隋志》称张望为“征西将军”。考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说：“晋代桓温参军张望亦有《正月七日登高》诗。”据此，《隋书·经籍志》称张望为征西将军，误。征西将军乃桓温，张望为征西参军。逯钦立校辑《全晋诗》，谓张“曾为桓温征西参军”，有集十二卷。逯说是。今存《蜡除诗》《贫士诗》《正月七日登高作诗》三首及残赋等数篇。

13. 毛伯成(生卒年不详)。此人事迹也不见史传。《世说新语·言语》九六载：“毛伯成既负其才气，常称：‘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刘孝标注引《征西僚属名》说：“毛玄字伯成，仕至征西行军参军。”据此，伯成乃毛玄之字，为桓温征西将军参军。《隋书》卷三五《经籍志》载：“《晋毛伯成集》一卷，又，《毛伯成诗》一卷。”今诗文全佚。钟嵘《诗品》列毛伯成为下品，评曰：“伯成文不全佳，亦多惆怅。”

14. 孙盛(生卒年不详)字安国，太原中都人。博学，善言名理，先为陶侃、庾亮、庾翼等僚属。穆帝永和元年(345)，桓温任荆州刺史，孙盛为参军。永和二年(346)，孙盛随桓温伐蜀，守辇重，蜀平，赐爵安怀县侯，累迁温从事中郎。随温入关平洛，以功进封吴昌县侯，出补长沙太守。晚年，因老还家。孙盛有良史之才，著《魏氏春秋》《晋阳秋》，并造诗赋论难数十篇。生平见《晋书》卷八二《孙盛传》。

15. 郝隆(生卒年不详)字佐治，汲郡人。据《世说新语·排调》三五，郝隆作桓温南蛮参军，性滑稽诙谐。诗文不存。

16. 顾恺之(约346—407)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人。恺之博学有才气，桓温引为大司马参军，甚见亲昵。后为殷仲堪参军。《晋书》卷九二《顾恺之传》说：“初，恺之在桓温府，常云：‘恺之体中痴黠各半，合而论之，正得平耳。’故俗传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顾恺之为人矜尚自负，《世说新语·文学》九八说：“或问顾长康：‘君《筝赋》何如嵇康《琴赋》？’”顾曰：“不赏者，作后出相遗；深识者，亦以高奇见贵。”《隋书·经籍志》载：“晋通直常侍《顾恺之集》七卷。注：梁二十卷。”另有《启梦记》三卷和《晋文章纪》，皆佚。今仅存《雷电赋》《筝赋》《嵇康赞序》等残篇，《神情诗》《拜桓宣武墓》残句。钟嵘《诗品》列顾恺之诗为中品，云：“长康能以二韵答四首之美。”“二韵”，所指诗篇不详。

17. 谢安(320—385)字安石。少有重名，初隐

居会稽东山，朝廷数次征聘皆拒而不出。弟谢万北伐，兵败废黜，安始有仕进之意，然这时已四十出头了。谢万废黜在升平三年(359)，谢安为桓温司马，大概在升平三四年间。安在温府的时间不长，不过三四年。《隋书》卷三五《经籍志》载：“《晋太傅谢安集》十卷，梁一卷，录一卷。”谢安因在温府的时间较短，估计所作的文章不会很多。谢安诗现存《与王胡之》诗六章、《兰亭》诗二首(见逯钦立校辑《全晋诗》)。

18. 王坦之(生卒年不详)字文度，年轻时就有大名。坦之先为简文帝抚军将军掾属，后出为大司马桓温长史，不久以父忧去职。坦之父王述卒于太和三年(368)。据此可知，坦之出为桓温长史在此年之前。坦之诗文今存《废庄论》等数篇。

19. 王徽之(生卒年不详)字子猷，王羲之之子。性卓犖不羁。为大司马桓温参军。原有集八卷，现仅存《兰亭》诗二首(见逯钦立校辑《全晋诗》)。

桓温自永和元年(345)至宁康元年(373)，先后镇守荆州和姑孰，首尾将近三十年。他本人虽雄豪一世，率领千军万马，但好文学，喜玄谈，在东晋历史上网罗天下文士无出其右。《渚宫旧事》卷五说：“温在镇三十年，参佐习凿齿、袁宏、谢安、王坦之、孙盛、孟嘉、王珣、罗友、郗超、伏滔、谢奕、顾恺之、王子猷、谢玄、罗含、范汪、郝隆、车胤、韩康等，皆海内奇士，伏其知人。”

上文所述文士十九人为大体可考者，可能是桓温幕府的文士还有庾悠之和丘道护。《隋书》卷三五《经籍志》注：“大司马参军《庾悠之集》三卷。”此大司马很有可能就是桓温。《隋书》同卷又载：“征西主簿《丘道护集》五卷。录一卷。”征西，当是征西将军桓温。可以肯定，桓温幕府中的文士，必不止以上所考的十九人。洋洋多士的桓温幕府，在当时已是无可比拟的文学创作中心。

二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说：“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以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这一看法是符合实际的。不仅学术宗教如此，文学创作也同样与家族、地域不可分离。

桓温幕府中的文士主要来自两大地域：一是江陵、襄阳为中心的荆楚地区，如习凿齿、罗友、罗含、孟嘉等；一是吴越地区，如郗超、谢奕、谢安、谢玄、

王珣、顾恺之、王坦之等。荆楚和吴越向来就是文化发达的地区,桓温镇守荆州和姑孰,当地的名士纷纷依附,攀龙托凤,以求仕途上的发展,从而形成文学创作的盛况。

荆州文化的发达渊源有自。早在汉末刘表占领荆州时,州治襄阳便是学术和文学的中心。刘表治理有方,“万里肃清,大小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金。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蔡母闾、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后汉书》卷七四《刘表传》)当时的襄阳不仅是经学复兴的中心,也是文学创作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当地名士蒯越、蔡瑁,外来文士王粲、士孙文始等咸来归附,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文学集团。

西晋时羊祜、杜预先后镇守荆州,重视文化教育。《晋书》卷三四《羊祜传》说:“祜率营兵出镇南夏,开设庠序,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晋书》卷三四《杜预传》说:羊祜卒,杜预都督荆州诸军事,“预以天下虽安,往战必危,勤于讲武,修立泮宫,江汉怀德,化被万里”。羊祜、杜预开设学校,使荆州再次成了文化发达的地区。虽然不闻羊、杜吟咏之事,当时荆州也未形成文士集团,但羊之《老子传》及杜之《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盟会图》《春秋长历》,都成一家之学,行于当世,沾溉后人。

桓温作荆州刺史,不遗余力延揽海内名士,明显继承了刘表、羊祜、杜预等先辈讲武修文的作风。如果说,在“江汉怀德,化被万里”的德政仁风方面,桓温可能逊于羊祜、杜预,那么,饮酒赋诗、互竞短长的文采风流,则远远超越前人。毋庸置疑,府主桓温是荆州文士集团的领袖。尽管文献资料散佚严重,但今读《世说新语》《晋书》《渚宫旧事》等典籍,当年荆州及姑孰的文学活动还能依稀可见。

《世说新语·排调》三五说:“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娵隅跃清池。’桓问:‘娵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三月三日,古代又称“上巳日”,有至水边游嬉,祛除不祥的风俗,叫做“修禊”。到后来,上巳日渐成了文人饮酒赋诗的佳日。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支遁、孙绰、谢安等数十人,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曲水流觞,赋诗咏怀,成为中古时期最有名的文酒之会。桓温与僚属于三月三日作诗饮酒,与兰亭雅集同一风气。郝隆

不善吟咏,只得受罚,而性好谐谑,竟然以蛮语作诗,又以“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数句回答桓温,必定使满座绝倒。

张望《正月七日登高作》诗仅存四句:“玄云敛夕煞,青阳舒朝英。熙哉陵冈娱,眺盼肆回目。”描写早春时节登高远望所见景物和愉快的心情,很有可能作于为桓温幕僚之时。

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记载:九月九日,征西大将军桓温游龙山,参佐毕集。“有风吹孟嘉帽堕落,温目左右及宾客勿言,以观其举止。君初不自觉,良久如厕。温命取以还之。廷尉太原孙盛,为谘议参军,时在坐,温命纸笔令嘲之。文成示温,温以著坐处。君归,见嘲笑而请笔作答,了不容思,文辞超卓,四座叹之。”九月九日为重阳节,古代有登高赋诗的习俗。桓温与参佐游龙山,命文士作文嘲谑取乐,这是魏晋时期常见的谐隐风气,伴随着良有趣味的文学活动。刘勰《文心雕龙·谐隐》说:“魏晋滑稽,盛相驱扇。”正是这种嘲戏风气形诸为俳谑之文。可惜孟嘉和孙盛的妙文不可得见,但可以推断,他们的文章必定属于束皙的《饼赋》之流,属《文心雕龙》所说的谐隐文学。

《世说新语·文学》九二:“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时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字足韵,当佳。’袁即于坐揽笔云:‘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世说》此条生动地记述了桓温幕府文士的创作活动,很值得注意。据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说:“宏从温征鲜卑,故作《北征赋》,宏文之高者。”温北征鲜卑在太和四年(369),袁宏《北征赋》即写于此时。《世说》此条记桓温与诸文士商榷文章,以求尽善尽美,可见他们创作态度的认真。刘孝标注引《晋阳秋》与《世说》不同,而于文士商榷文章记叙更详细:宏尝与王珣、伏滔同侍温坐,温令滔读其赋,至“致伤于天下”,于此改韵。云:“此韵所咏,慨深千载。今于‘天下’之后便移韵,于写送之致,如为未尽。”滔乃云:“得益‘写’一句,或当小胜。”桓公语宏:“卿试思益之。”宏应声而益,王、伏称善。王珣、伏滔都是写文章的行家里手,以为益“写”字足韵更佳,确实深得文理。而袁宏不愧温府的文士之冠,揽笔便益,文思何等敏捷。至于桓温对袁宏文采大加赞赏,也显出府主暨文坛中心人物的身份。

与桓温北征鲜卑有关的文学活动,又见于《世

说新语·文学》九六：“桓宣武北征，袁虎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东亭在侧，极叹其才。袁虎云：‘当令齿舌间得利。’”袁虎虽然被责免官，可作露布文还得请他。袁虎真是温府文士中的翘楚，倚马可待，难怪王珣极叹其才，桓温则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世说新语·言语》七二：“王中郎、伏玄度、习凿齿论青楚人物。临成，以示韩康伯。康伯都无言。王曰：‘何故不言？’韩曰：‘无可无不可。’”伏滔列举春秋时的鲍叔、管仲至魏时的管宁等先贤，以为是“青士有才德者”；习凿齿则举楚士的接舆、渔父等高人隐士，认为青州难同楚士相提并论。魏晋时品题人物之风盛行，这是形名之学复兴的表现。伏滔、习凿齿论青楚人物优劣，说明东晋中期形名之学尚在流行。

《世说新语·文学》九七：“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所记与《世说》不同，云袁宏作《东征赋》，悉赞过江诸名望，却独不道桓温的父亲桓彝。后袁宏随桓温同游，温问：“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温溢然而止。记载虽不同，但都见出袁宏《东征赋》在当时享有盛誉。

从《世说新语》等书的记载，大致可以发现桓温文士集团的文学活动有两个特点：

第一，如陈寅恪所说，“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以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如前所述，荆州的文化学术传统渊远流长，东晋中期桓温镇守荆州，使这一地区的文化再度兴盛。温后移镇姑孰，彼地距京师建康甚近，温府文士的文学活动，为以建康为中心的文化圈注入了强劲的活力。例如《世说新语·文学》二九说：“桓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邪？’”此事必在桓温移镇姑孰后。在这里笔者对寅恪先生的论断作一点延伸意义上的补充，这就是不仅学术宗教与家族、地域不可分离，文学创作也与以上两点不可分离，而且往往与幕府有关。如果府主雅好文学，那就会招致文士，形成规模

不等的文学创作中心。桓温如此，其子桓玄后作荆州刺史，也喜好文艺，与文士谈论、吟咏不辍。此为后话。上述特点是中古时期的幕府所共有的，甚至在后世也经常如此，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普遍性的现象。

第二，游宴、战争与文学有密切关系。刘勰论及曹魏文学的盛况时说：“……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谈笑。”（《文心雕龙·时序》）“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都谈到了游览宴饮和文学创作的同时共生。在中国文学史上，游宴文学传统经久不衰，风月、池苑、杯觴、谈论、忖笑，会极大地激发文思。桓温与众僚佐上巳日行觴赋诗，孙盛与孟嘉作文嘲谑，都属古来有之的游宴文学。

从本质上说，桓温集团是东晋中期最强大的军事机器，桓温是无人可及的军事强人，吟诗作文乃是余事而已。当时，江左东晋政权与北方的异族政权之间战争频仍，桓温有扫平河洛的大志，多次率众北伐。于是，文学创作就与战争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桓温命袁宏作《北征赋》和露布文，都是突出的例子。倚马赋诗是桓温幕府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他们的作品气魄比较宏大，涉及的社会生活内容也很广泛，这与会稽地区王羲之、支遁之流单纯的文咏并不一样。

三

桓温幕府既然云集了海内一时名士，则理所当然地取得了堪称一流水准的文学业绩。他们的文学活动及文学创作，显示了中国文学在东晋时期的演进。

桓温留存作品中完整的有《荐谯元彦表》（为萧统收入《文选》）。《文选》李善注：“孙盛《晋阳秋》曰：‘谯秀字元彦，巴西人，谯周孙，性静不交于俗。李雄盗蜀，安车征秀，秀不应，躬耕山藪。桓温平蜀反役，上表荐谯秀也。’”谯元彦是蜀中不乐世俗的隐者之流，桓温上表荐谯秀，是魏晋时期崇尚隐逸之风的反映。当然，统治者“搜扬潜逸”，无非是标榜政治清明，借隐士来“笃俗训民，静一流竞”，而隐士则常常被主政者用作点缀“美政”的道具。桓温这篇表文运用典故多且贴切，文采较佳。

桓温幕府中的文士数袁宏最有名，现存的作品也相对较多。他的《东征赋》《北征赋》虽存少许残文，但以管窥豹，仍可依稀看出这二篇巨制非同凡

响。《东征赋》描写海天之境:“洲渚迢递,磯岫虚悬,即云似岭,望水若天。日月出乎波中,云霓生于浪间……”(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五七)生动地勾勒出宏大的景物,鲜明如画。《北征赋》描写秋天夜景:“于时天高地阔,木落水凝,繁霜夜洒,劲风晨兴。日暖暖其已颓,月亭亭而虚升。”(同上)语言精练,状物准确。特别是“日暖暖”二句,写秋天的日落月升,语言珠润玉圆,且富有动感。袁宏的《夜酣赋》写歌女也很精彩:“开金扉,坐琼筵,卫姬进,郑女前。形窈窕以纤弱,艳妖冶而清妍。似春兰之齐秀,像明月之双悬。”其中“春兰”“明月”之喻,才思不浅。袁宏在魏晋赋家中属一流人物,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梗概”,义同“慷慨”。上面所举的《东征赋》《北征赋》的残文,都气势充沛,所谓“梗概”即指此。“情韵不匮”可能指袁宏《夜酣赋》一类游宴之作,且能注重赋作语言的韵味饱满圆美,如作《北征赋》采纳王珣的建议,补上“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一韵。刘勰称袁宏是“魏晋之赋首”,说明在南朝人眼中袁宏的赋具有很高的地位。

袁宏的名作《三国名臣序赞》被萧统《文选》和《晋书·袁宏传》收录。此文赞三国名臣荀彧、荀攸、袁涣、夏侯玄等二十人,是魏晋时期品题人物之风的反映。文章旨在赞颂三国名臣,表达“君臣相体”的政治观。文前的序说:“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难遭时难,遭时匪难遇君难。故有道无时,孟子所以咨嗟;有时无君,贾生所以垂泣。夫万岁一期,有生之通途;千载一遇,贤智之嘉会。遇之不能无欣,丧之何能无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明君、贤臣千载一遇的嘉会,令作者感慨良深。据这一情绪判断,此文很有可能作于他入京作吏部郎期间。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是颂赞一类文体中的佳作。且不说它对人物的评价是否公允,仅以遣词造句而言,词约义广,气足韵亮,颇堪诵读。如“赞”之开头概括描写三国分裂之时的天下形势:“洪飏扇海,二溟扬波。虬兽虽惊,风云未和。潜鱼择渊,高鸟候柯。赫赫三雄,并回乾轴。竞收杞梓,争采松竹。凤不及栖,龙不暇伏。谷无幽兰,岭无亭菊。”以新奇而众多的意象,描述了汉末天下分崩,三方鼎立,士人惶惶然四处寻找出路的社会图景,笔力雄健,文采焕发。

袁宏也有诗名,钟嵘《诗品》置于中品,称“彦伯《咏史》,虽文体未遒,而鲜明劲健,去凡俗远矣”。《咏史》二首为谢尚赞赏,作于入恒温幕府之前,这

里略而不论。其他留存的残诗有《从征行方头山诗》《采菊诗》《拟古诗》及佚题诗。《从征行方头山诗》存八句:“峨峨太行,凌虚抗势。天岭交气,窈然无际。澄流入神,玄谷应契。四象悟心,幽人来憩。”从“峨峨太行”句判断,此诗大概随恒温北征时作,先写景后谈玄,完全是玄言诗气格。《文心雕龙·明诗》说:“江作篇制,溺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以下,虽各有雕彩,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刘勰认为袁宏的“辞趣”与江左玄言诗一致,而且把他和玄言诗的代表孙绰并提。证以《从征行方头山诗》,刘勰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另一首《采菊诗》仅存四句:“息足回阿,圆坐长林。披榛即澜,藉草依阴。”叙事写景,简洁干净。

习凿齿以文笔著称,现存的几篇书信都较有文采,其中《与桓秘书》最佳。据《晋书》卷八二《习凿齿传》,凿齿忤恒温后,出为荥阳太守,罢郡归,因与温弟秘亲善,致书秘。此信缅怀襄阳先贤,大发悲慨:“每定省家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北临樊墟,存邓老之高;南眷城邑,怀羊公之风;纵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鱼梁,追二德之远,未尝不徘徊移日,惆怅极多,抚乘踌躇,慨尔而泣。”“若向八君子者,千载犹使义想其为人,况相去不远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畴辰,百年之后,吾与足下不并为刘景升乎!”作者自以为才能可以比匹先贤,但今时非昔时,俊才可能变为“碌碌凡士”,因而触目悲感。这篇书信精心结撰,中间多用排比句,渲染悲情,文前文后多用散句,十分宜于表情达意,有着强烈的抒情色彩。

伏滔作品以《正淮》最有名。《伏滔传》说:“从温伐袁真,至寿阳,以淮南屡叛,著论二篇,名曰《正淮》。”恒温伐袁真在太和五年(370),《正淮》作于此。这是一篇史论,先探讨淮南屡叛的原因,这便是上篇所说,“本其所因,考其成迹,皆宠盛祸淫,福过灾生,而制之不渐,积之有由也。”进而论述如何效法先王,防微杜渐,深固治政的根本,避免昔日的祸患。文章征引繁博,文气充沛,有战国策士言谈的遗风。

罗含的《更生论》是一篇哲学论文,论述天地万物的变化,主要论点是万物“更生”,也就是循环往复,无有终极。作者认为:“今谈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达观者所以齐生死,亦云生为寤寐。”依此说法,“我”不变,变者仅为今我、昔我而

已。不待多追问就可发现,“更生”的终极者就是“神”,它是不灭的。这与佛教的轮回说相通,或者说,罗含的“更生论”,乃是“神不灭论”的变种。

郗超佞佛,他的《奉法要》是佛教史上有一定地位的佛学论文。这篇文章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佛教的“五戒”“十善”“五道”“十恶”“五阴”等基本教义,表现出弘扬佛法的高度热情。郗超诗仅存四言《答傅郎诗》六章,为典型的玄言诗,阐释柱下之旨,漆园之义,也夹杂佛理。如第一章:“森森群像,妙归玄同。原始无滞,孰云质通。悟之斯朗,执焉则封。器乖吹万,理贯一空。”开头二句用《老子》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之义,末二句先用《庄子·齐物论》南廓子綦“吹万不同”的典故,后用佛家的色空之义。其余几章都是阐释玄理,味同嚼蜡。

王珣善文能诗。今留存《林法师墓下诗序》《孝武帝哀策文》《祭徐聘士文》等残篇。虽然挂一漏万,但仍能看出作者的才思。《林法师墓下诗序》写作者于宁康二年(374)往剡县石城山凭吊支遁墓,触景伤情:“高坟郁为荒楚,丘陇化为宿莽,遗迹未灭,而其人已远。感想平昔,触物凄怀。”抒写一种人所共有的年命短促、物在人亡的悲伤,极具感染力。《孝武帝哀策文》是一篇保存完整的祭文,艺术性较高。如描写弥漫灵堂内外的死寂哀痛的气氛:“二气代变,霜繁广除。风回高殿,帷幕空张。肴俎虚荐,极听无闻,详视罔见,人神道殊。”以环境衬托悲情。后面写灵车出宫:“挽哀唱以翼衡,驷悲鸣而顾舟。违华宇之晰晰,即永夜之悠悠。奉灵榭而长诀,缅终天而莫收。诉穹苍以叫踊,洞五内其若抽。”从以上二篇文章来看,王珣善写哀情的才能,恐怕不在潘岳之下。

王珣还有一篇《经黄公酒垆下赋》,所赋为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之事。《世说新语·伤逝》二说:王戎为尚书令,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车后客曰:“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羈縻。今日视此,邈若山河。”王珣的这篇赋早已散佚,但在当时很著名。据《世说新语·轻詆》二四,王珣此赋载在裴启的《语林》中。有一次庾敳(道季)在谢安处谈论裴启所写的《语林》,后者对《语林》不以为然,庾敳以为谢安的态度不是很好,于是就读王珣的《经黄公酒垆下赋》。

顾恺之是桓温幕府中最重要的文士之一。他入桓温幕府较晚,多数作品可能产生在温死后。《诗

品》将顾恺之置于中品,称“长康能以二韵答四首之美”。古直《钟记室诗品笺》以为“二韵”指《艺文类聚》引的顾恺之的《神情诗》:“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寒松。”其实,这首《神情诗》不象是完整的诗,而且仅写四季景色,算不上佳句。从“二韵答四首之美”推测,可能是首赠答诗。《世说新语·言语》九五说:“顾长康拜桓宣武墓,作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人问之曰:“卿凭重桓乃尔,哭状其可见乎?”顾曰:“鼻如广莫长风,眼如悬河决溜。”或曰:“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顾恺之甚受桓温亲昵,因此有山崩海竭,鱼鸟何依之感。至于哭状写得过于夸张,近于谐戏了。顾恺之拜桓温墓作诗不止一首。《文选》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诗李善注:顾恺之《拜桓宣武诗》曰:“远念羨昔存,抚坟哀今亡。”所写的哀痛之情很动人。

顾恺之文,多数无法确知创作年代。他的文集梁时尚有二十五卷,可见著述不少。从留存的《雷电赋》《观涛赋》《冰赋》《湘中赋》《箏赋》《凤赋》等残篇看,以咏物居多。《箏赋》是其中的佳作,否则恺之不会以“高奇”自赏。可惜此赋只存寥寥数语。他的咏物赋状物精细、生动,艺术性较高。《冰赋》残存的一段就相当精彩:“尔乃连绵络幕,乍结乍无,翕然灵化,得渐已粗。绀白随川,方圆随渠。义刚有折,照壶则虚。托形超象,比朗玄珠。一宗理而常全,经百合而弥切。转若惊电,照若澄月,积如累空,泮若堕节……”把结水成冰的“灵化”现象以及冰的色、形、质等特性,一一写来,状物十分精妙。尤其是“转若惊电,照若澄月”数句,写出了冰在不同形态下的澄彻空明,几至化境。

张望留下的诗有三首,其中《贫士诗》似完诗,也较出色:“荒墟人迹稀,隐僻间邻阔。苇篱自朽损,毁屋正寥豁。炎夏无完絺,玄冬无暖褐。四体困寒暑,六时疲饥渴。营生生愈瘁,愁来不可割。”诗中的贫士可能就是诗人自己,住在人迹罕至之地,残篱败屋,一年四季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结句“愁来不可割”,出语新奇,极富有表现力。

张望的赋有《枕赋》《鸛鹄赋》《蜘蛛赋》三篇,皆残缺。魏晋咏物小赋的创作思路,一般都是托物寓意。张望的后二篇赋也是如此。前者从鸛鹄的“乐水以游”,有感“率性命以闲放,独遨游而获全”的道理。后者写蜘蛛“乘虚运巧”,吐纤绪而结网,向往序文所谓“欲足生命,萧然清逸”的境界。

桓温幕府文学活动中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是对文学音韵之美的研讨。上文所引《世说新语·文学》九二记袁宏作《北征赋》，听从王珣“足韵”的建议，增添二句后意蕴更佳。由此可见东晋作赋已在追求声韵的调谐。《文心雕龙·章句》说：“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积韵”谓不转韵，“资代”（资，当作贸），即迁代，指转韵。可见曹操以为作赋须善于转韵。可见从汉末起，文学作品就开始追求宫商相应，音韵调谐。陆机《文赋》说：“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要求文章声律配合和谐。《文心雕龙·声律》说：“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楚谓楚声，不合雅音。《世说新语·文学》八六说：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范荣期所说的“非宫商中声”，即不合宫商，意谓孙绰自诩的“金石声”，恐怕尚不合音韵之美。袁宏、王珣等讨论《北

征赋》的改韵，与范荣期评论孙绰《天台山赋》意义相同，都表明东晋的文学创作较为注意声韵调谐之美，这透露出中古声律说渐渐萌芽之消息。这种文学现象，当与魏晋清谈、佛经诵读以及梵呗的赞唱有关。

东晋文学散佚之严重，令后人浩叹。以致今天谈东晋文学，唯有陶渊明。其实，当年轻恒温幕府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卷帙就非常浩繁。遗憾的是，仅凭这些断简残篇，不可能再现当年恒温幕府的文学盛况，也很难对此作出深入细致的分析。不过从这些文学遗存，还是大致可以想象东晋中期以荆州和姑孰的济济多士为创作主体的文学盛况。在中国文学史上，东晋时的幕府文学已相当成熟，王导、庾亮、恒温、桓玄等幕府，先后聚集了不少文士，其中恒温集团中的文士最多也最有名。弄清楚这一文士集团的形成及创作情况，对于研究东晋南北朝和后世的幕府文学，都有一定的意义。

[责任编辑 李有梁]

Study on the Scholars of Huan Wen Mufu and the Literary Activities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GONG B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Huan Wen, a military scientist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had held the post of Cishi (a provincial governor) in Jingzhou for several decades. He is not only a statement and a strategist, but also interested in literature very much. He likes to recruit and gather literary talents, so Jingzhou became a main center for literary creation. Through analyzing so many scholars in Huan Wen Mufu (office of a commanding general), describing their literary activities and commenting their literary works, we can present a missed prosperous time in the Eastern Jin literary history. Based on investigation on the scholars and the literary activities in Huan Wen Mufu, we can prove that the ancient literary creation is related to family and territory, and Mufu literature is non-neglectful in literary history research.

Abstract: Huan Wen Mufu; Yuan Hong; Gu kaizhi; war; traveling and taking part in party